

1/1988

时代建筑

清华大学出版社



顾问(按姓氏笔划为序)

方鉴泉 冯纪忠 陈从周
陈 植 吴景祥 汪定曾
金经昌 倪天增 钱学中
黄家驊 谭 垣

编委(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吉鑫 王绍周 刘 云
刘佐鸿 庄涛声 邢同和
李 玫 李德华 吴庐生
沈 恭 来增祥 张庭伟
张乾源 张耀增 陈翠芬
罗小未 金大钧 洪碧荣
顾 正 翁致祥 郭小苓
陶德华 章 明 黄国新
黄富丽 董鑑泓 蔡镇钰
戴复东

主编 罗小未

副主编 王绍周

常务编委 金大钧 来增祥
张庭伟

编辑 徐 洁 支文军

编务 吴克宁

编辑者: 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
《时代建筑》编辑部

出版者: 同济大学出版社

函购: 同济大学出版社
(上海四平路1239号)

印刷者: 上海市印刷三厂

发行者: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我国城市规划学科的开拓者——金经昌先生……………廷 尉 3

·理论历史·

从未来主义到当代理性——论现代意大利建筑的发展道路…郑时龄 7
建筑在文化关联中的可识别性……………支文军译 肖伟校 13

·青年园地·

苏州寒山寺名胜区规划刍议……………金云峰 周 宁 18
对建筑理论若干含混问题的思辩……………陈军余 22

·环境雕塑·

人情与自然——R·费歇尔的环境雕塑……………毛伟编译 李涛校对 26
亨利·摩尔的雕塑艺术与建筑……………许祥华摘编 30

·工业设计·

论工业设计师……………辛华泉 34
工业设计专业学生入学素质的初探……………王曾伟 38
形态的释放——产品设计的平面、立体表现……………倪 炎 41
视觉传达设计中的秩序与空间效果……………徐里君 44

·设计实践·

高层建筑防火分区的设计……………章孝思 45
华东化工学院电化教学楼设计……………黄天德 51

·规划探求·

加里福尼亚中心……………邱贤丰编译 54
G 博姆——
获得者……………之君编译、肖伟校对 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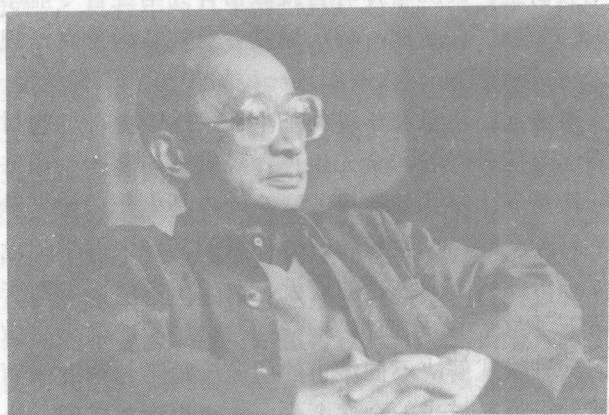
兰州大学……………封面
立体构成……………封二
工业设计……………封三
贝吉希——格拉德巴赫市政中心……………封底

TIME + ARCHITECTURE

Vol. 7 1988 No. 1

CONTENTS

Prof. Jin Jingchang—Founder of the Discipline of Urban Planning in China	
.....	Tin Wei 3
Theory and History	
From Futurism to Contemporary Rationalism — On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Architecture in Italy	Zheng Shiling 7
Architectural Identity in Cultural Context	
.....	Translated by Zhi Wenjun, Proofread by Xiao Wei 13
Young Architects	
A Plan for Hanshan Temple Scenic Spot, Suzhou.....	Jin Yunfeng, Zhou Ning 18
Several Ambiguous Theoretical Issues of Architecture.....	Chen Junyu 22
Environment and Sculpture	
Robert Fisher's Environmental Sculpture	
.....	Translated by Mao Wei, Proofread by Li Tao 26
Henry Moore's Sculpture and Architecture.....	Xu Xianghua 30
Industrial Design	
On Industrial Designer.....	Xin Huaquan 34
Qualities for Admission to Industrial Design Speciality.....	Wang Zhenwei 38
Two or Three Dimensional Presentation for Industrial Design.....	Ni Yan 41
Order and Spatial Effect in Design for Visual Communication.....	Xu Lijun 44
Ingenuity in Practice	
Fireproof Zoning for Highrise Buildings.....	Zhan Xiaosi 45
Audio-Video Education Building of East China Institute of Chemical Industries.....	Huang Tiande 51
Urban Planning	
A Plan for Center of California	Qiu Xianfon 54
Pritzker Architecture Prize 1986 Laureate — Gottfried Böhm	
.....	Zhi Jun, Xiao Wei 62



我国城市规划学科的开拓者

——金经昌先生

廷尉

青年负笈，飘洋过海，攻读于西欧大陆的达姆斯塔城；壮年奋力，苦心开创了中国的现代城市规划学科；暮年不息，奔走疾呼于城市建设各个领域。其为人也，方正耿直而嫉恶如仇，严于律己而诲人不倦，思绪敏捷而娴于文词。他，就是七十六岁的同济大学城市规划教授金经昌先生。

(一)

众所周知，现代城市规划理论成熟于二次大战时期，而传入中国，则已到战后。三十年代，金经昌先生得到德国洪堡奖学金资助，离开母校同济大学而赴西欧，先攻市政工程，后转城市规划。就读德国期间，经历了战争和战后的重建，还参与过德国达姆斯塔城市的初期恢复工作。四十年代末，决心归国，希望把“规划”理想贡献于祖国。回国后他首先投入的工作是上海市的都市计划。当时的中国，“都市计划”这一事业很少有人关心，甚至被讥为“多事计划”。但在赵祖老领导之下，包括金经昌先生在内的主其事的专家们，却并不就此草率从事。他回忆说，虽被讥为“纸上谈兵”，但“倒也读过一些‘兵书’。沙里能的有机疏散理论，爱波克隆比的战后大伦敦规划，旁及英、法、德、奥的其他著名典籍，什么霍华德的花园城市呀，什么勒·柯比西埃的明日之城呀，等等等等。”上海市的都市计划总图从一稿做到三稿，“三稿”完成于解放上海的炮声中，全市解放后的1949年6月1日，几位专家才把精心制作的“三稿”图纸捧出来向人民政府献礼。“上海市都市计划总图三稿”是第一次比较成熟地把现代规划的理论应用于中国城市建设的实践，尽管尚有不足，但至今仍有参考价值。更重要的是，正是通过这个工作，“有机疏散”理论，道路按性质分系统，“邻里单位”等当时最新的规划理论传入了中国。

(二)

1952年院系调整后，同济大学建筑系成为国内建筑教学重镇之一，并成立了由金先生任

主任的我国第一个城市规划教研室。1953年即有首批城市计划与经营专业学生毕业。又于1956年在全国第一个成立了“城市规划专业”。从此，同济城规专业被认为是我国规划教学界的“大本营”，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毕业生。作为我国第一位城市规划学科教授，金先生为此倾注了大量精力，不但在具体教学事务上，而且在学科的基本理论建设上，他也付出了不少心血。由于是新兴学科，规划理论急需学习国外经验。金先生说：“经验学习是一个艰辛的过程。我国城规理论有两次大的学习过程，一次是五十年代的学习苏联，一次是七十年代末学习西方。两次过程我们有得有失，值得总结。”学习苏联时，从学校的教学体制到实践中的规划设计，都有全盘搬套的倾向。其结果，一方面是促进了新兴工业城市的建设，诞生了象洛阳、西安等一批工业中心。另一方面带来了“单一性”，留下了急于“抛弃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简单化做法。传统的城市风貌被遗忘了，片面地希望以同一种模式解决不同城市的问题。地不论南北东西，城不分南昌兰州，行列式、兵营式的居住区随处可见，城市的个性渐失，而变得面貌雷同。金经昌先生不但在讲课中表示不同意见，并在自己的实践工作中身体力行。他参与的曹阳新村(一期)、同济新村规划，创立了新的模式：新村道路分类分级，住宅成组成团布置，河流组织到绿化系统中，从公共空间到私有空间，形成了有序的空间层次，使居住区不但有亲切气氛，也有各自个性。这两个新村建成后，受到来访国内外专家的一致好评。十年动乱中，金先生受到巨大冲击，但打倒“四人帮”后，他又焕发了青春，重新担任城规教研室主任。1980年，他应德国洪堡基金会的邀请，再次访问德国。三十年后旧地重游，他看到了战后欧洲建设正反两面的经验。

近年来，西方规划理论进入中国，活跃了思想，促进了学科的发展，但也有一些不足。金先生结合自己的体会，尖锐地指出：“各地盲目学习西方高层建筑，以为非此则无以体现现代化。中小城市把主要财力投放在高层建筑上，使有限的投资无法满足正常城建的需要。同时，建了高层又没有省出更多空地作为绿地和交通用地，这显然是不当的。西方的高层建筑主要是旅馆和办公楼，而我们则主要盖高层住宅，如北京的前三门。这是近年学习西方经验中的失策。”这也更说明发展中国自己规划理论、指导工作实践之必要。

(三)

几十年来，金经昌先生对我国城市规划工作提出过很多有价值的建议，他称为“想法”。为了提出这些建议，老先生不知调查过多少城市，做了多少报告。由于他那出名的率直和不留情面，甚至还得罪过不少人。但“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先生的学生遍布各地，先生的学说也广为传布了。

早在数十年前，金先生就提出过“疏散上海”的方针。他认为，大城市“摊大饼”那样的发展形式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与之相反，应采用“组团式”的用地结构：城市划分成若干综合组团，其中有生产设施，也有生活居住内容。这些组团用两套道路系统来联系：一是“藤和瓜”的关系。“瓜”是组团，“藤”是交通性道路，在各只“瓜”的边沿切过，但不进入；二是“冰糖葫芦”，“葫芦”是组团，“竹签”是生活性道路，在“葫芦”(组团)中串而连之。如果建立了那样的城市结构，则交通性的货运车流和生活性的公交人流可以分开。他又提出，在我国自行车多的情况之下城市内的道路系统应该成为两个错开的井字系统，即一条机动车道路和一条自行车道路互相间隔，各成系统，则成为矛盾焦点的交叉口的交通组织可大为简化。对于以自行车为主要交通手段的我国，建立这样的自行车专用道尤为迫切。总之，无论城市结构还是交通组织，关键是一个“分”字，城市

要“分块”，交通要“分流”，自行车与汽车要“分道”行驶。

这些学术观点最初不被人理解，现在则不但被广为接受，而且被采用到各地规划中去了。说到这里，金先生不由要称赞上海市的总体规划，认为这个规划提出把全市分成九块的想法是很正确的，也正是当年“上海市都市计划三稿”的出发点。他还进一步希望能把中心城的一大块也设法“切”开，用绿带及交通性道路作间隔。

在理论上的“想法”，需要不断探索。而正确的想法一旦应用，就能大大改善城市建设工作。在上海铁路新客站的规划设计中，金先生提出了“架空式站屋”的想法。他认为，这种综合利用空间的方法，有三大优点：一是节约用地，站屋架空在铁道上，可以减少征地。二是便利交通，车站位于市中心，南北两向均有客流。架空站屋可以从南北两面进入，又和城市地面交通组成立体网络，全市居民均可便利使用铁路，而入站后到上车也得以最为近便。三是有利施工。架空站屋施工对现有铁路影响最小，新旧车站的新陈代谢，可在“动态过程”中完成。这是一个好“想法”带来的好成果。在各方努力下，现已接近完工。

(四)

金先生对己对人的严格要求，集中反映在他的职业道德观上。他为人正直，提倡说实话，即使得罪某些领导，也决不作假，并常以此教育学生。

他说：有人认为“规划规划，纸上画画，墙上挂挂，不如领导一句话。”这自然反映了过去对规划工作不重视。但要社会真正重视规划，规划工作者就一定要有真才实学。否则那些“残次商品”流传出去，实施后将贻误百年。真是那样，则宁可让它们“墙上挂挂”，领导不听也是完全有理的。对规划人员的真才实学的培养，规划教师应负很大责任。规划要能真正实施，规划教师本身应有实践能力，要能把图上的一条线化为一条道路的设计、放线甚至施工。作为全国规划教师最集中的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一定要兢兢业业做好教学工作。

金先生有时谑称自己为“升斗小民”。但这位年迈的“小民”却时时关心着国家的大事。近年来，国力渐强，旧城改造提上了议事日程。可是在改造时每倾心于大拆大建，以所谓“经济效益”作唯一评价依据。金先生出于职业责任感，大声疾呼，提出意见。他反复说：城市规划包含着经济因素，但不全从经济考虑。老城区是民族历史文化的积淀，不能轻易否定。规划时必须先做好“建筑质量评定图”，什么要保留，什么可拆除，才可心中有数。规划图不是现状图，不能只顾眼前利益而为未来留下障碍。他常提起的一个佳例是上海北京路的改建，经过几十年努力，到1978年才把最后一段瓶颈地段按当年的红线拓宽了。他称赞说：规划工作者就是要有这种韧性和耐心。

职业道德观还反映在工作优劣的评价依据上。金先生认为，什么叫改善城市的生活环境质量？不是靠建设几个什么中心，不在于那些高楼大厦，而要从改善最基本的生活条件着手，从厨房、厕所、幼儿园、中小学……的改善做起，要让人民群众满意。他曾写道：上海的人口密度已达四万人一平方公里，上海的公共汽车挤到每平方米站十一个人，上海很多孩子没有游戏场，这些才是最重要的问题，比那些“艺术中心”“游乐中心”之类不知重要多少倍。他说：“城市的规划与建设是具体的为人民服务，要解决好人民的衣食住行问题。”又告诫说：“在宾馆里幽扬的乐声中，不要忘了‘四万人一平方公里’！”为民之心，跃然纸上。也许有人会讨厌这位爱多发议论的老人，但他并不计较这些！

回顾金先生数十年来的城市规划生涯,可看到与国家建设紧密相连的足迹。五十年代的新兴城市和工人新村,六十年代的卫星城,七十年代末的大城市问题,到八十年代的上海振兴,他觉得这一系列国家建设之急需,是和他忧乐与共的。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如今,金经昌先生早已踰越古稀,但认识他的人都说他老而不倦。近年来,先生不但积极出席各种学术活动和市府会议,而且文思如涌,写了不少言简意深的小品,有的议论城建,有的针砭时事,貌似严厉,心实良苦。至于金先生(金石声)在摄影界的地位和作用,更是众所周知的。作为中国著名摄影杂志“飞鹰”的创办人,五十年来他以立意新颖、构图严密、用光精湛的作品著名。现在则不但化费大量时间于国际国内摄影界的活动,而且仍然勤于创作。

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此非先生之写照耶?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

(上接第12页)

人感到预制装配建筑通常很难避免的单调和沉闷,却使人联想到文艺复兴建筑那简朴而又清新的发展。

六十年代末期在意大利初露端倪的高技术建筑,在今天已成为新理性主义建筑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它的发展仍可追溯到三十年代理性主义建筑运动。奈维在三十年代就曾是佛罗伦萨理性主义建筑运动的中坚,他所设计的佛罗伦萨体育场至今仍可称之为杰作。战后他的一系列现浇钢筋混凝土建筑创作都表达了结构的理性,一种表达事物内在的结构理性甚于力学结构的更深一层的理性。

意大利的复杂地形和地质条件,丰富的水力资源以及亚平宁山脉所带来的南北交通的困难,为结构工程师设计大坝、桥梁及各种构筑物、建筑物提供了广泛施展才能的机遇。在这方面,1902年诞生的莫尔兰迪是继奈维之后的又一个卓越代表。1969年他为罗马机场意大利航空公司设计的波音747机库,体现了意大利结构工程师特有的聪睿、敏感的审美观。

伦佐·庇阿诺曾与罗杰斯共同设计了蓬皮杜中心。他的事务所长期以来一直是意大利高技术建筑的中心,近年来已愈益受到国际建筑界的瞩目。无论是新建筑或是旧建筑改建甚至

旧城改建,他和他的助手都采用了高技术来解决一切问题。去年刚完工的巴黎郊区蒙特洛格工厂的总体改建中,他用一座现代的帐篷结构复盖地下汽车库的地面建筑,他把这个地面部分设计成公共活动空间并冠以意大利传统的“广场”之名。然而高技术建筑很难与传统建筑取得协调,在一般情况下也很难为人们所接受,在他们前面的道路也特别困难而又曲折。

在意大利还有大批优秀的建筑师徘徊徜徉于各种创作道路之间,他们都经历了长期的探索过程。意大利特有的历史条件使建筑师们不可避免地必然受到传统建筑的启示。一方面,他们永无休止地追求建筑创作的完美,另一方面又想充分地表现自己的个性。

对于所谓“理性”的理解,它是建筑的美,建筑的本质,它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取决于建筑师的素质和建筑师认识、理解世界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从文艺复兴以来,许多建筑师就以其毕生的精力孜孜不倦地力图把握建筑的脉胳,认识建筑的真谛,从而表现自己。

理性主义不应当成为一种先验的东西,不应成为建筑师自圆其说的幌子,它不应束缚建筑师,使其头脑僵化。

从未来主义到当代理性主义 ——论现代意大利建筑的发展道路

郑时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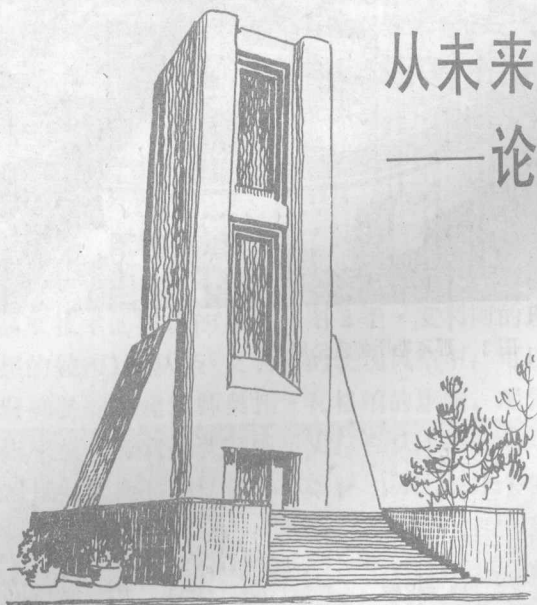


图1 科莫湖畔的战争纪念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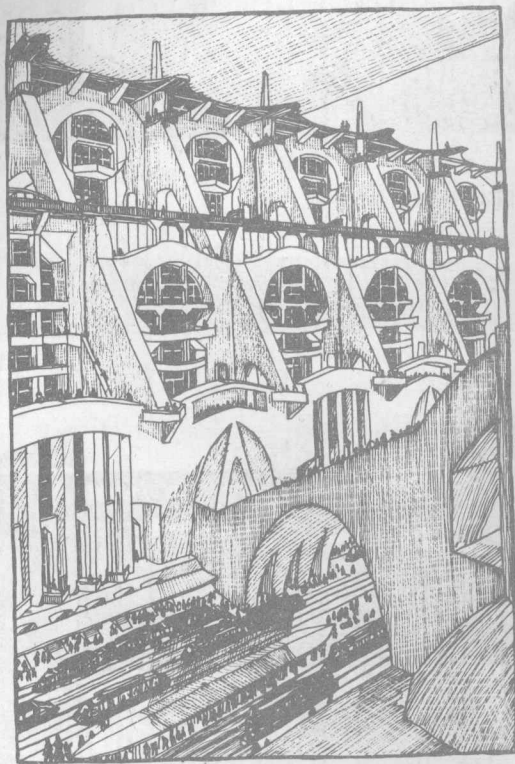


图2 圣·艾利阿的理想的城市

现代建筑在意大利的发展经历过相当曲折的过程。有着二千多年历史的意大利建筑的传统影响始终左右着人们的思想。二十世纪初正当中欧及北欧的工业化已具备相当规模时，意大利仍徘徊不前，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今天。另一方面，在文化思想上，又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日益发展的科学技术和新思想的冲击，在整个意大利的发展却是不平衡的。在北部较发达的工业城市如米兰、都灵等地，无论是工业化或是生活方式上都更接近欧洲发达国家，正是在这片土地上酝酿了意大利的现代建筑运动，并对当代意大利及世界建筑产生了重大影响。

1909年2月意大利青年作家马里奈蒂(F. T. Marinetti)在巴黎的《费加罗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未来主义宣言》，其后，许多画家和建筑师纷纷响应并投入未来主义的行列，几年之后，未来主义的影响波及整个欧洲，以后又传至美洲大陆。1914年7月年轻的建筑师圣·艾利阿(A. Sant' Elia 1888—1916)发表了未来主义建筑宣言。未来主义者们讴歌新时代的高速美，本着“反学院、反文化、反逻辑的世界观”要把意大利从“教授、考古学家、导游者和古玩家的溃疡里挽救出来。”圣·艾利阿认为“自18世纪以来就不存在建筑。”他们的主张之所以相当偏激，正是出自于想摆脱传统另辟新蹊的强烈愿望。由于圣·艾利阿过早地于1916年死

于未来主义者所鼓吹的“使世界健康化的唯一手段”——战争中，他在许多建筑画中所表现的理想还没有来得及付诸实现，他所留下的唯一作品是科莫湖附近的艾利西别墅(1911年建)，带有浓烈的维也纳分离派色彩。但未来主义的建筑思想，创造新的人为环境的呼声在意大利第一代现代建筑师——米兰七人集团的作品中得到实现(图1 科莫湖畔的战争纪念碑，1933年由理性主义的代表人物戴拉尼根据圣·艾利阿1914年所作的灯塔草图而设计建造)。

未来主义建筑理想的主要特点为利用外露的活动构件如电梯、传送带(甚至包括室外繁忙的街道)表现所谓的动力造型，应用内在的象征性的表达方式，利用心理和物理上的移情作用试图把现实以其真实的面貌呈现出来，以改变我们所惯用的观察事物的方式。主张“在表现自然的时候，最最重要的是真挚和纯粹。”它不同于立体主义纯粹从体量的分解上来观察世界的方式。提倡“唯一的从根本上革新建筑艺术的道路，就是回到‘需要’上去。”未来主义者并不像其他的欧洲现代建筑大师那样晦言艺术，他们认为“真正的建筑艺术并非是实际与功利的贫乏无味的组合，而仍是一种艺术，也就是说，是一种综合体，是一种表现。”“建筑艺术必须使人类自由地、无拘无束地与他周围的环境和谐一致，也就是说，使物质世界成为精神世界的直接反映。”强调了建筑艺术的时代性。现在重温这些观点并对照现代建筑所走过的道路会引起我们的认真思考。

未来主义者们搅动了意大利学院派和文化界的一潭死水，从根本上向陈规陋习挑战。死气沉沉的意大利建筑在经过将近二个世纪的贫乏和冷漠之后，他们认为，即便是“流氓行为”也比麻木不仁更值得称道，在蔑视对历史盲目崇拜的同时，激起了对历史的虚无主义态度。他们呼吁立即用倾颓坍塌的宫殿的废料填没作为历史象征、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之一——威尼斯的大运河，烧掉千百年来富于诗情画意的贡多拉船，废除古老的哥特式建筑如火焰、如



图3 那不勒斯邮政总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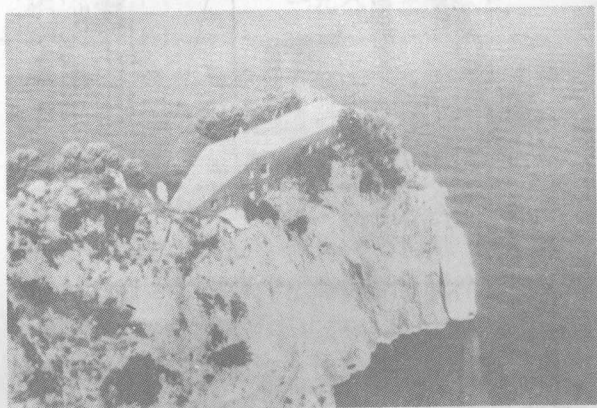


图4 玛拉巴尔别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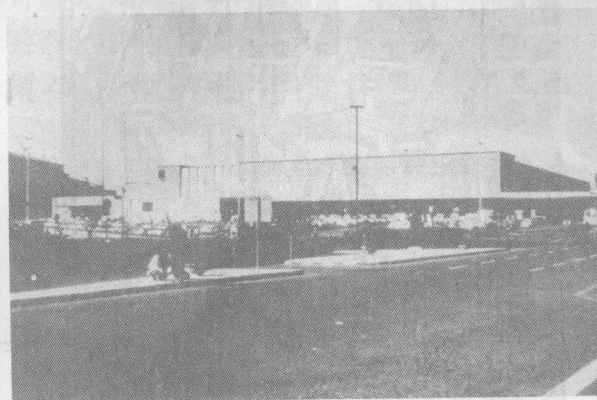


图5 佛罗伦萨火车站

花朵般令人伸往的线条,甚至鼓吹把作为文化象征的图书馆的书架烧个精光,挖掉那神圣古老的城市的基础。意大利未来主义建筑及艺术的发展,实质上是欧洲先锋派探索未来的一个缩影,为当代建筑的发展播下了种子,为二十世纪建筑的发展起了先兆及预示的作用。

未来主义者的创作思想,诸如台阶式的高层建筑、外露的电梯、多层次立体交叉的空间城市等,自圣·艾利阿以来就一直在许多建筑师的创作中加以试验、推广,并成为一些表现高度技术的建筑的原型(图2圣·艾利阿的理想的城市)。从圣·艾利阿的表现风格中,可以看到奥地利建筑师奥托·瓦格纳的影响。尽管未来主义者宣称要割断历史,否认“我们只是祖宗们的概括和延伸”,却始终无法脱离这个生他、育他、由历史形成的现实世界。

图6 米开卢契设计的教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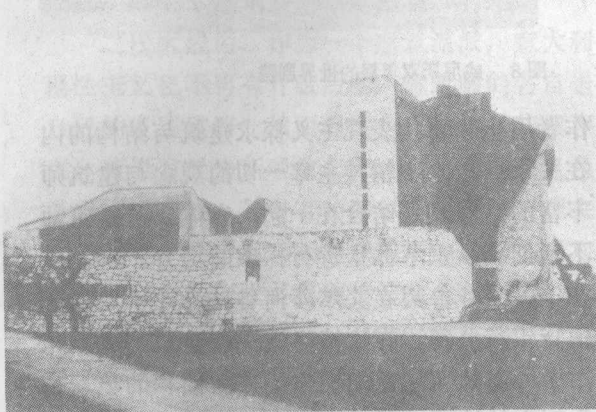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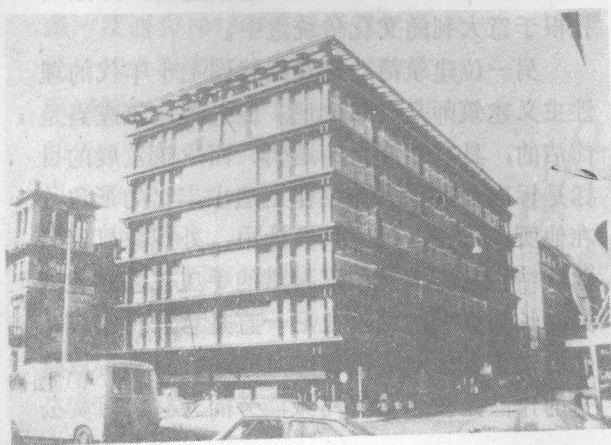


图7 罗马“复兴百货商店”



米兰七人集团于1926年组成,随后于1928年和1931年相继在罗马举办了两届理性主义建筑展览会,这是现代意大利建筑发展成长的重要阶段。七人集团的代表人物是利培拉(A. Libera 1903—1963)和戴拉尼(G. Terragni 1904—1943)。

理性主义者主张建筑是继承传统的,然而又应当代表当代的意大利,他们植根于意大利的历史渊源之中。尽管作为一个有组织、有纲领的流派,理性主义到了1935年以后逐渐与法西斯主义的御用建筑师协会融为一体,然而理性主义建筑思想及创作构思手法却一直主宰了意大利建筑界,并延续至今。理性主义建筑师的优秀作品在意大利建筑史上确实起了承前启后的重大作用,这些建筑对于它们所位于的城市和乡镇有着特殊的意义。尽管他们的建筑作为客观实体也可以归结为纯粹的几何形体,似乎超脱于时间和空间,然而经过认真的分析、考察后,人们会发现它们与所处的社会的、自然的、物质的环境却是那样的协调,以致于无法与环境割裂。

理性主义试图提供一个对于机器时代生活的答案,探求结构、功能或设计的“理”。他们主张“……新的建筑,真正的建筑应当来自于对理性的追求。……我们并不要求创造一种新的风格,然而由于不断地寻求理性,使建筑尽可能完善地满足各种需要,我们确信一种风格将会诞生于新陈代谢的过程中。”并提出了他们所追求的新精神:“新一代宣告了一场建筑革命,然而这是一场目的在于构成和建造的革命,一种对真诚、规律和理性以及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对于清晰的思想的执着与追求,这些就是新一代精神的真正的特征。”然而不同的建筑师由于思想、境遇和经历的差别,对于“理”有着各人的理解,不同的环境和空间,形成了理性主义建筑丰富多彩的发展道路。理性主义建筑同未来主义建筑思潮一样,试图在他们的创作中反映新的生活和时代精神。新的、象征工业时代的建筑类型首先成为刻意表现的领域,火车

站、工厂、邮局、体育场、百货商店等是理性主义建筑师偏爱的题目(图3,那不勒斯邮政总局,1935年,由佛兰契等设计)。

二次大战前,理性主义建筑运动只是一泓涓涓细流。随着战后迟迟才来到意大利的工业化发展,建筑师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汇集到这股洪流中去,并从六十年代茫然不知所从的困惑中走向一个模糊然而却相当执着的目标。

玛·庇阿简梯尼(M. Piacentini 1881—1960)是三十至四十年代理性主义在法西斯主义时期的代表人物。他所表现的是一种纯化装饰的古典主义,从形式上追求纪念碑式的雄伟效果,冷漠而又倨傲,先验式的教条驱除了理性。偏离了理性主义的信条。布鲁诺·赛维认为庇阿简梯尼作为建筑师,自1925年以后已名存实亡。然而,仍有许多建筑师依然坚持理性主义的创作道路,一些人沿着这条路一直走入战后年代,直至今天。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利培拉、戴拉尼、阿尔比尼(F. Albini 1905—1977)、米开鲁契(G. Michelucci 生于1891年)、利陶尔菲(M. Ridolfi 1904—1984)等。

利培拉于1938—40年设计建造的卡普里岛上的玛拉巴尔代别墅,表现了建筑师在处理环境方面的特殊才能(图4)。这是一座庄严的房屋,它既是抽象的又是抒情的。面对着湛蓝的大海,以它那隐晦的入口、埃及墓穴式的构图,呈示了作者进退维谷的思想。人们首先只能从高高的峭壁上眺望这座被无边无垠的大海和嶙峋的岩石映衬得分外红彤彤的建筑物,使人们产生肃穆的敬意。这种敬意来自于对庞贝废墟宅邸中鲜艳的庞贝红,来自于对古典建筑和文艺复兴建筑的简洁而又真诚的理念。

米开鲁契及一些托斯干纳建筑师在1953年设计的佛罗伦萨火车站(图5),以其简朴的形象及合理的功能布局,被莱特称为“有机建筑”。它体现了自文艺复兴以来那种追求纯朴的理想,在意大利当代建筑史上被誉为本世纪最重要的建筑之一。然而,在米开鲁契于1960—1964年设计的太阳高速公路旁的教堂(图6)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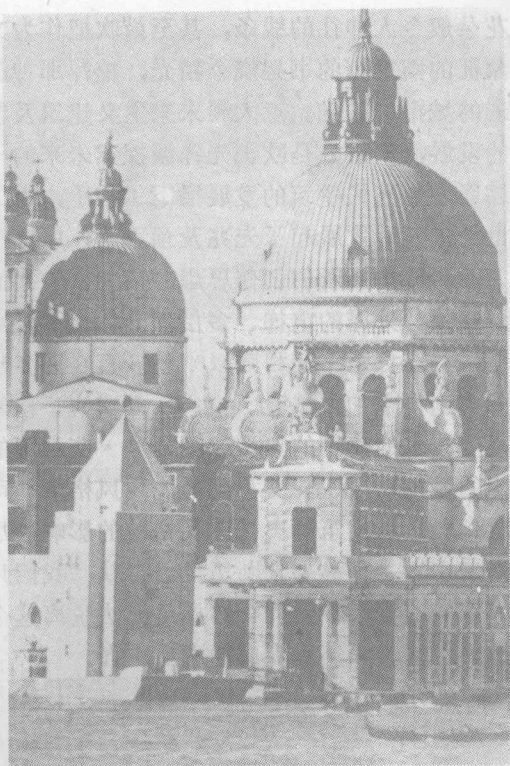


图8 威尼斯双年展的世界剧院

作者用生物结构表现主义探求建筑与结构的内在关系。教堂中精神主宰一切的观念与建筑师丰富的空间表现结合在一起,它体现了建筑师不断创新,永不休止进行探索的努力。1973—78年,米开鲁契在艾尔莎河谷城设计了巴斯基信贷银行分行。在这幢建筑中,建筑师大胆采用了外露的大红色的钢构架、大面积的玻璃窗和石砌的墙面。尽管它是那样的现代化,然而与古老的城市却相当协调,这位建筑大师始终扎根于意大利的文化传统之中。

另一位建筑活动一直延续到七十年代的理性主义建筑师是阿尔比尼。他主张建筑应当是简洁的,具有功能上的逻辑,而建筑发展的目标是标准化。在具体创作上追求丰富的形象,在他所作过的大量家具设计中,外观象机器时代的结构只有以艺术家精湛的手工艺才能创造。长期以来,阿尔比尼一直是意大利建筑文化的代表。他的最重要也是唯一在罗马得以建造的作品是位于古罗马城墙旁的“复兴”百货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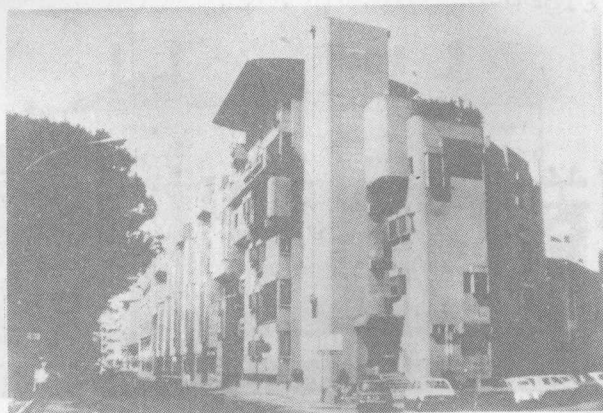


图10 庇阿简梯的大街住宅

司大楼，这是一幢十层(其中地下三层)钢结构建筑(图7，1957—61年设计)。建筑师试图以墙面强烈的明暗对比和轮廓起伏、简洁明晰的结构节点，使人联想到巴洛克建筑。它那暖色调的石板饰面、大面积的实墙与古老的城墙相呼应，体现了建筑师的卓越素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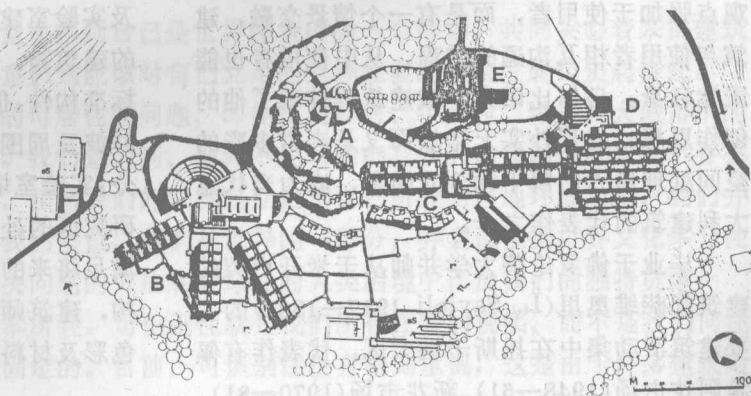
二次大战后，作为一个建筑流派，意大利理性主义已不再有什么活动，建筑师们各自走自己的发展道路，然而理性主义的精神依然存在，直至发展新理性主义，它是理性主义色彩斑斓的发展。其中有利陶尔菲倾向于表现主义的建筑，他曾在1980年威尼斯的国际艺术双年展上被誉为探求并发掘传统文化的先驱。有奈维(P. L. Nervi 1891—1979)在结构、材料及新技术的运用上所展示的理性。也有阿尔多·罗西(Alto Rossi, 生于1931年)试图以简朴的几何形体和框架表现深层的“理性”(图8, 阿尔多·罗西为1978年威尼斯双年展设计的世界剧院)。在他设计的世界剧院中，建筑物暖色调的墙面和天兰色的屋顶映衬在那秀丽的白色的威尼斯海关和圣母玛利亚教堂的背景上，宛若来自更古老的年代，然而仔细看，它又是新的、现代的建筑物。当人们参观威尼斯美术学院画廊时，在“英国大使朝觐威尼斯大公”那幅画中

的亭台楼宇上，可以发现建筑师的灵感和创作源泉有着深厚的历史传统。有人说，阿尔多·罗西是后现代主义者，其实，这顶“桂冠”并不适合他。如果说他的作品追求古典主义的风格，有精湛的文脉，那倒是确实的。意大利当代建筑师所表现的新古典主义有历史的根基，并非无病呻吟，更不是文化的沙漠中虚构的泉水和绿洲，它体现了千百年来建筑师对完美的意境和理性的追求。

夸罗尼(L. Quaroni 生于1911年)也是一位重要的新理性主义建筑师。他在创作上永不休止的探索就是当代意大利建筑的一面镜子，似乎处于永恒的矛盾之中。夸罗尼信奉抽象的建筑构成，导致了“符号”和其意义之间的分离。他试图通过不同材料的运用来达到所谓对事物内涵的“领悟”，代表作是70年代中期在格罗塞多市设计的多功能建筑物。这是一组紧靠旧城中心的建筑物，包括邮局、银行、商店、百货公司、办公楼、学校、住宅等。在设计上，建筑师受到诸如三角形的基地形状、建筑高度上的限制，同时，与大多数当代意大利建筑所面临的问题相同，建筑师必须在设计与古老的环境协调，考虑邻近的建筑文化环境。正是在这样的多种限制下，建筑师发挥了他的创作才能并取得了成功，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新理性主义建筑师深深扎根于传统文化之中。

在此，想着重介绍当代意大利新理性主义建筑的代表人物，建筑师和理论家德·卡罗

图9 乌尔比诺大学总平面



(Giancarlo De Carlo 生于1919年),他在米兰开设了一所事务所,主编在意大利及世界各国颇有影响的建筑文化杂志“空间与社会”,兼任热那亚大学及威尼斯建筑学院的教授,还担任锡耶纳国际建筑师暑期研究院的院长。他的一系列最具代表性的建筑作品、著作及规划思想是奉献给文艺复兴大师拉斐尔的故乡乌尔比诺市的,其中尤为著名的是以人文学科为主的乌尔比诺大学的新校舍建筑群(图9,1962—1966、1973—1981)。这组大学城建筑群座落在离乌尔比诺老城约一公里的喀布契尼山丘上,可容纳一万学生学习及居住(而乌尔比诺市原有的居民仅七千人)。其中包括教室、办公室、会议厅、学生宿舍、图书馆、娱乐中心、剧场、餐厅、商店、体育馆等,整个建筑群由四个学院组成。象植物那样蔓延在山丘上,与地形和环境融成一体。自五十年代起,由于作者对这座古城进行了深彻的分析研究和一系列的创作实践(改建、新建及城市的发展规划),他的创作经验也趋于成熟,因而获得了成功。一位建筑师如此长时间卓有成效地从事一座城市的建设工作,这在当代西方建筑界可说是绝无仅有的。

德·卡罗主张:“建筑的目的不仅是创造一个客观实体,它也在成形的物质过程中为人们的活动塑造具体的空间。这一过程不仅存在于成形之前,同时也一直延伸到人的记忆并深入到其他过程中。……建筑也存在于形体与外在的物质世界的关系之中,取决于谁在使用中观察甚至在邂逅中体验建筑。”并没有将建筑师的观点强加于使用者,而是有一个情景交融,建筑与使用者相互沟通的过程,从中使用者也能表达自身。乌尔比诺大学城建筑群体现了他的创作思想,他那朴实无华然而又是丰富多彩的空间处理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成为当代意大利建筑的代表作之一。

毕业于佛罗伦萨大学并师从于米开卢契的建筑师萨维奥里(L. Savioli 1917—1981)的主要建筑活动集中在托斯干纳大区,代表作有佩希阿花市场(1948—51)、新花市场(1970—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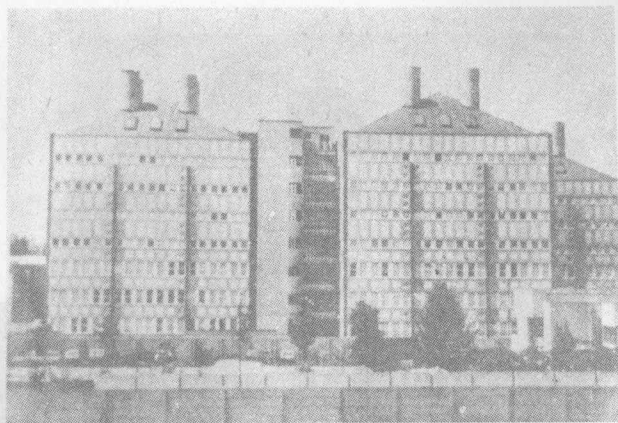


图11 米兰大学生物系大楼

佛罗伦萨底阿简梯那大街上的住宅(图10, 1964)以及一系列城市及小区的规划设计方案等。对于他来说,空间意味着墙里面所展现的客观存在。所以当他接到任务的时候,并不急于去设计,也不作所谓初始的方案构思。从他的草图中丝毫也看不出有什么设计,它们只是些抽象的形象轮廓,只是人们活动的踪迹而已。他说:“只有当空间已展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才能设计。”他在设计中力图表现城市及建筑的“理性”及设计方法上的内在规律性。从他众多的丰富多彩的建筑作品中可以看到他这一努力的足迹。在设计方法上及建筑形象的探索方面他是走在世界前列的,他设计的佩希阿新的花市场可以说是开创了意大利和欧洲各国“高技术”建筑的先导。

马吉斯特列蒂(V. Magistretti)和索罗(F. Soro)为米兰大学理学院设计的生物系大楼反映了近十多年来各国著名建筑师致力于学校及实验室建筑上的成就。这是一幢功能性很强的建筑物。由于工期和造价限制,结构上采用标准构件,但在形式上仍给人一种欢快的气氛,并波及周围的其他建筑。这组建筑群由二个部分:实验室塔楼和低层的教学部分组成(图11)。研究区的处理方式可以提供高度灵活的空间以满足将来的需要。整组建筑均采用预制装配结构,建筑师利用外墙板的节奏变化,利用体量、色彩及材料的变化,赋予建筑韵律感,并不使

(下转第6页)

建筑在文化关联中的可识别性

(Architectural Identity in the Cultural Context)

支文军译 肖伟校

【译者语】

一九八五年七月二十九日至三十日，APAC^①（亚洲规划和建筑协会）在东京召开了一次题为“建筑在文化关联中的可识别性”的讨论会，它是继一九八四年秋在马尼拉召开的第一届亚洲建筑师大会后又一次有关亚洲建筑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APAC的部分成员和一些特邀代表，他们是来自西太平洋地区（West Pacific Region）的日本、中国^②，东盟国家、中国的香港地区以及印度的规划和建筑专家。

会议的主题是有关亚洲城市和建筑的可识别性问题。会议认为亚洲正面临着西方现代派建筑和后现代主义建筑的挑战。如何进一步发展亚洲的传统文化、进一步提高亚洲建筑的可识别性问题，已成为当前十分迫切的问题。亚洲的建筑只有在积极接受来自西方的挑战、有效地发挥亚洲的文化优势中才能有出路，才能得出一个创造性的回答。会议共发表了代表们的十几篇论文，并进行了建设性的讨论。代表们对以下的论题如建筑的社会性、建筑与文化的关系、亚洲的城市化、建筑师的作用、乡土建筑等等表示了特别的关注，并对举行下一届大会的必要性作了充分的肯定。会议还根据讨论的内容，起草并通过了代表们自认为是“宣言草案^③”的宣言。这份宣言不仅为下一届会议的“正式宣言”作了准备，而且总结了会议的思想和见解。无疑，这些见解对亚洲城市和建筑的发展必将起到促进和指导作用。

序言 (Preamble)

我们，一群个体的建筑师，自觉地感到自己是世界建筑师的一个部分，共同关心着来自建筑领域的挑战和危机。然而，我们更意识到应该对自己立足的亚洲社会的建筑发展担负起责任。

我们所共同关心的是这个世界的可居住性问题，即体现在乡村、半乡村、城市与大城市中的人为环境中的居住质量及其人情性。我们意识到，那种不论对谁都有效的建筑创作方法是不存在的。我们必须放眼全球地考虑问题，虽然我们的双脚是立足于自己所处的当地环境之中。我们并不企图要为世界的利益讲话，但是我们坚信，我们是世界的一部分，并尝试根据世界文化多元化的特点，要在传播我们自己地区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全球性的人类困境中作出我们的独特贡献。

寻找可识别性并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可识别性就是我们所存在着的现实，而不是我们向往的东西。它确实就在那里，但不是固定的。目前，可识别性没有得到重视，这是由于许多建筑师无法对当地的环境作出明确的反应。其实，在我们的文化关联中就存在着可以发展更为丰富或更

为恰当的可识别性的余地。

我们研究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可识别性，而是为了一个更富于人情的世界；是为了在美学上同样会有收获的建筑形式和空间表现；是为了解决一些特殊的社会问题。建筑师的贡献既要是全球性的，也要是属于地方层次的；不是排他而是兼容的。然而，亚洲的问题不同于西方的问题，所以解决方法也可能是不同的。

我们以复数的含义来谈论亚洲，而不是指某一方面。沙漠地带完全不同于太平洋沿海地区，因而我们不能笼统地在文化、气候或建筑学上来谈。印度化与中国化之间有着非常大的差别，因此用通常所谓的“共同体”是不确切的。差别存在于任何地方，如果你不深入到当地环境和人们中去，任何地方要想有出色的建筑都是困难的。

我们意识到东西方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别。亚洲人有他们自己的“软件”，这与他们基本的生活方式和“不可见的形式”（“invisible form”）是密切相关的。在亚洲文化的特色中，存在着某些共同之处。这就是一种人与人之间不拘礼节的关系；在城市中混合有乡村生活的特色；不成文的相互之间的信赖；一种不象美国那么易破裂的家庭结构。试图保存持续的家庭结构是有重要价值的，不过现在许多现代家庭正在失去这种依附关系。上述种种现象对建筑设计，尤其对低收入住宅设计会有什么关系呢？

要辨别亚洲城市形态的共同性是可能的（建筑的可识别性必须与形式相联，必须与形态学相联）。例如，日本的经济可能是西方型的，但它的城市形态则倾向于亚洲型，这就是那种毫无拘束的、把乡村型的自然景观与多用途的综合用地方法结合到城市的建筑面貌中去的做法。

在西方，许多人一直假设城镇中心是文明的发源地和温床。这种说法在那些较为古老的社会，尤其在象亚洲的一些国家里也是可信的吗？能否说乡村地区是创造活动的中心呢？迅速发展的城市既然是乡村和城镇的混合物，那么，对于创造力的论点又是什么呢？

面对传统和现代化的相互矛盾，我们对建筑师在他自己的文化背景中的地位又应作出怎样的解释呢？

我们应如何重新解释传统，以便创造一种新的乡土文化呢？

我们又应如何把个人的创造性融合进集体的目标呢？

问题的说明(Problems and Issues Identified)

我们这些建筑师聚在一起，接受毫无特点的现代主义和西方后现代主义的挑战。我们认为，西方和世界的建筑已走进死胡同，但无论如何，我们没必要去指责西方。从本质来看，回复到过去不再是可行的了，我们必须向前看。

会议讨论的焦点不在西方本身，而在于怎样接受挑战——那些来自西方的肆意的商业渗透和消费者第一的思想影响（目前东方正处在沦为西方抛弃用户第一主义和商业主义思想垃圾场的危险之中）。现在所有的文化对我们都是开放的，我们与其试图去防御西方的威胁，不如在重新理解和重新繁荣我们自己的当地文化中提取精华。在向前寻找我们的方向时，我们的任务是有选择地运用形形色色的世界文化，以适合自己的需要。

因此，目前的问题不在于接受挑战而是作出反应，先从“如何生活”的关键问题开始，然后缩小到解决某一地区，以及建筑方法论问题。

西方的规划基本是静止和有限度的，就象 CIAM 等所提出的那样。为了满足变化的需要，

为了二十一世纪，我们需要在规划方面有一个连续的、无止境的尺度。相比于可见的有组织的结构来说，东方城市的随意性、无终止性、以及对“次序混乱”的运用更能对变化作出反应，更有适应危机的能力。

我们认为，普遍的机器技术已冲淡了手工艺的技能。为了恢复人的参与因素，我们应该恢复对手工艺的欣赏和支持。不管我们是否是朝着日本式的机器人时代或硅时代发展，我们意识到亚洲应在使技术人情化上起特殊的作用。

也许，除了来自于现代化的问题以外，还存在着更重要的问题，它形成于我们自己的社会内部：人口迅速增长和城市化问题；缺少适当的基础设施问题；在条件相差悬殊的环境中存在着贫民区、土地私有和过份密集的问题。这些问题若施加在城市身上，就会导致对传统文化价值的破坏，从而削弱人情的习俗。目前，部分的社区生活已有下降的倾向，而犯罪行为的级别正在上升。这是建筑师必须处理的种种问题，此外，它们还引出了诸如什么是建筑师（在亚洲的）的作用、责任和职能问题、建筑教育以及赤脚建筑师和手工艺者的培训问题以及建筑的社会化和基层群众介入的重要性等问题。

态度和反应 (Attitudes and Responses)

建筑和规划目标必须指向二十一世纪

(Architecture & Planning Must Address the 21st. Century)

在回答西方提出的内省和回顾的问题上，我们的态度是要向前看，目标指向未来。如果完全回逆到传统只能是自我毁灭。因此，我们必须重新解释传统，以便创造一种新的乡土文化。

着眼全球

(Think Globally)

不仅仅是我们受西方的影响，西方也正受到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思想的影响。接受世界是多元化的观点，从中寻求有意义的答案，这对我们来说是恰当和中肯的。

同理，我们须要运用西方的设备和世界的技术，但在方法上，要能与我们的传统一致并能鼓励我们的人们。

的确，不存在一种对一切都为有效的建筑创作方法，但用着眼全球的眼光来对待传统和建筑遗产的线索，那么，各种先进技术和思想都可以溶合到我们自己的当地环境中来。

创造一种新的乡土性

(Invent a New Vernacular)

我们承认，有许多建筑要设计，但又没有足够的建筑师来从事这些工作。因此，除非我们能发明一种既能适合人们需要，又能满足气候、技术和经济条件的乡土建筑，不然，我们就难以解决这个巨大的问题。

假如我们能把传统这个词重新解释为按当地的情况合适地综合文化遗产与全球性技术的话，我们就有可能获得一种新的乡土性。由于这样做是困难的，我们必须把最富有创造性的思路集中于这一点。

新的乡土性最终可能会发展为集体的努力，但它的出现需要个人的创造力，即通过那些专为特殊建筑而作出的、以不同的语言表达出来的各自的象征性建筑表现中获得。

技术人情化

(Humanize Technology)

面对摧残人性日益严重的技术世界，我们正在失去使用双手的权利，正在失去人情的习俗。

亚洲人可以在赋予技术以人性的领域中作出贡献。亚洲人使大城市人情化的能力还可以应用到小件的技术用品和机器人技术上。

建筑师是催化剂

(The Architect As A Catalyst)

建筑师是人类居住环境的形状与功能的体现者。对于那些能与他的人们与文化一致的建筑师来说，一个十分重大的任务就是要在恢复环境的美学要求中起催化作用和在使居民点人性化中起工具性作用。他不应采取教人如何设计的方法，而是通过传播专业知识和信息来使技术成为人们能够理解的东西。

建筑师决不要等到有人请教时，才对基层群众的活动表示支持！

建筑师应把用来解决问题的方法反复同公众商讨，使之成为他们的常识并使他们成为决策者：这就是建筑社会化和减少专家评判的独断性。

在东方社会结构不太健全的社会里，建筑师作为变革工具的机会比较多——这与西方所谓的规划代言人(advocacy planners)的意义又是不同的。

与人们打成一片

(Identify With The People)

如果建筑师能与人们打成一片，就可以重新找到他们的“本能”。

现在，人们普遍地对于群众在改善环境中的力量与主命力有了一种新的认识。这些认识有可能导致新的模式：这就是城市居民会在发展基础设施、保存现有的艺术和工艺、以及创造更多的自力更生的就业机会中负起更大的责任。

从城镇形态及其活动的角度来看，会有许多产生于基层人们的城市，而不是设计者的城市。

适当培训建筑师

(Appropriate Training For Architects)

如果建筑师与大众协调一致，建筑教育、再教育、培训工作就应鼓励学生们去考虑有关环境的所有因素——从气候、建筑材料、技术、空间概念和历史等等基本原理开始，并特别重视当地条件和乡土文化(但不是排他的)。现在世界上的一切对于他们按着自己的地方条件来重新运用是开放的。

识别那些潜在的赤脚建筑师并使之有组织

(Identify and Institutionalize Potential Bare-Foot Architects)

鼓励当地的建筑技能，艺术和工艺可使城乡地区的木工和工艺大师获得新的尊严与地位。把他们吸收到建筑协会中，即把他们组织起来是很重要的。

一定还有许多手工艺者和木工从农村地区沦落到贫民区，他们没有施展才能的机会，也无法对建筑设计或环境作出贡献(虽然有些贫民区内部已有一些非官方的、能与就业机会联系起来的、接受援助或互助性的组织)。但是，如果这些人能够得到赏识，并给予一定的地位，使之有组织，那么，它不仅会促进生活水平的改善，而且还会促进艺术水平的提高。

改善农村的居住条件

(Improve Rural Settlements)